

第 一 章

导论 关于中国革命 研究角度的新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 20 年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无论怎样肯定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都不过分。然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社会上和学术界有一部分人,为了充分论证和平改革(或者一般意义上的改良)的伟大意义,开始对 1949 年以前的革命发生了怀疑。认为革命不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与演化的必然产物,而是少数人主观意志的结果。抽象地强调革命不如改良,断言如果近代中国不发生革命,中国的社会现代化发展得会更好些,不承认革命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之一。这些否定革命的观点虽然都建立在一系列‘假设’之上,但影响颇大,直接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有待中国近代史学界和中共党史学界的学者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这些问题主要是:革命是少数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还是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必然结果?是党派之间的权力纷争还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内在需求?换句话讲,近代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何在?革命运动进步的历史根据是什么?革命与社会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应该说,这些问题都是中国革命史研究中最基本的问题,是应该首先回答清楚的。然而,客观地说,这些问题解决得并不好,需要学术界在新的高度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与说明。

近代中国百年是急剧变革的大动荡时期，革命浪潮犹如大海波涛，跌宕相逐，一浪高过一浪，革命构成了这一时期历史的主旋律，中国革命史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甚至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体例和内容基本都是围绕革命运动展开的，在革命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革命运动的基本进程得到较细致的揭示。但也毋庸讳言，以往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也存在不少问题。总的来讲，主要表现为研究视野相对狭窄，研究深度不够。一是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几个革命事件和领袖人物展开，忽视了与革命相关的许多丰富的内容，限于就革命论革命；二是没有从整个近代社会演化的视野研究革命，对社会诸领域的变动与革命事变的互动关系没有给予深入的揭示，从而导致有关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较具说服力的说明；三是在论述革命的发生时，多强调社会的落后与萧条，作为参加革命的个体，似乎也是越穷越革命。应该说这是认识和研究革命的误区，尤其需要揭示社会发展与革命运动特别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自然还有中共党史及中国革命史学科的性质、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手段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也需要认真回答。这自然不是一个人或一时所能完全解决的，需要革命史学界的同仁从理论创新和具体而扎实的学术研究中逐步完成。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研究和革命史研究的根本理论，违背了它，革命史研究就不可能深入，甚至走人歧途。为了深化近代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有必要重新学习经典作家关于革命的论述及其研究方法，从中我们也许会找到深化革命史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政治 革命观的重新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对革命作了多方面的论述,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把握他们研究革命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再结合革命实践,将对我们深化革命史研究提供指导与启发。

经典作家对革命作过很多论述,可以归纳为革命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源、革命的胜利及革命的意义等三个方面。

一、关于革命发生发展的原因及其根源

这里讲的革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革命,而是指政治革命,即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夺取统治权的武装斗争,是一种政治制度代替另一种政治制度的激烈变革。

任何革命本身都意味着深刻的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所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发生,往往是社会发生危机的结果。经典作家在分析革命的篇章中十分重视对社会危机的分析。马克思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会谈到:“农业的这种困苦状况,加上商业的萧条,工业的停滞以及仍然在威胁着的财政灾难,必定会使法国人民处于他们通常起来进行新的政治试验时的思想状况。随着经济繁荣的消失以及通常相随而来的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的消失,第二帝国继续存在的任何借口也将消失。”^① 认为“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可能发生。”^② 列宁也曾进行深刻的分析:“千百万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1页。

不会根据政党的劝告去进行革命”；千百万人是不会按照定单进行革命的，只有在人民穷困不堪，再也无法生存，千百万人的共同压力和决心足以粉碎一切旧的壁垒并真正能够创造新生活的时候，他们才会起来革命。^① 列宁还多次指出：“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认识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②

经典作家所讲的引发革命的社会危机，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指广大下层人民生活困苦，难以维持基本生计，即发生生存危机；二是指社会生产尤其是新质的生产力发展，障碍重重，难以前进，从而出现发展危机。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往往引发革命，最终可归结为人类生存与发展而产生的各种需要不能得到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分为生存需要与发展需要。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解决吃、穿、住等基本问题，就必须进行生产（包括物质生产与人类自身的生产），人类的一切活动由此展开。处于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中的人们，势必要为自身的基本生存权利而斗争，那么各种社会矛盾也就产生，且日益激化，最终导致革命的发生。所以恩格斯指出：“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保证立即获得成功。但是，任何人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它把自己的枷

① 《列宁全集》第 30 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4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4 集，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93 页。

锁打破”。据此恩格斯认定,革命是‘民族的要求和需要的自发的不可遏止的表现’^①。

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往往相伴而生,较难区分,但二者还是有所不同。生存危机主要是指广大人民生活极端贫困而难以生存下去的事实,它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发展危机重在社会新质因素尤其是新生产力有了一定的发展后,由于受到旧的生产关系等种种因素的阻碍而难以继续顺利发展的状况。发展危机往往导致生存危机,生存危机成为发展危机的一个表现。在经典作家关于革命的论述中,单是生存危机而导致的暴力运动不一定是革命运动,他们在论述革命发生发展的原因时更注重发展危机。这种发展危机一方面包含新因素的一定发展,一方面包含其发展的制度性受阻,最终引发出为新因素顺利发展开辟道路的革命。由生存危机和发展危机相互作用而演化为政治危机,是革命发生发展的一个基本途径。

相对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生革命,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民族生存危机。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构成这些国家进行革命的一个基本的因素。被侵略国家该不该进行反抗侵略的革命,近年来也被质疑,而且观点对立的双方都从马克思那里引经据典,因此有必要重新学习马克思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侵略问题的论述。马克思是辩证地谈论这一问题的。一方面,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客观上打破了落后国家封闭的大门,使落后国家开始向世界先进文明靠拢,但另一方面,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给被侵略被奴役人民也带来了各种灾难,并认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必须起来进行斗争,才能将自己辛苦创造的果实收归自己所有。马克思在论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侵略时,就是辩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3页。

地看待这一问题的。他指出：“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①并断言：“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②但同时他也指出，英国破坏了印度的整个社会结构，印度失去了一个旧世界，却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③以后，马克思通过实际材料不断看到，英国侵略所带来的少许积极成果都淹没在他们对印度的暴行所造成的巨大破坏和浩劫中，以致越来越支持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起来反抗外国的殖民统治。我们不能只凭摘引马克思的片言只语作为立论的根据，而应首先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而把握他研究问题的基本立场、方法和观点。作为同情人民、憎恨剥削与不平等、为世界劳苦大众奋斗终生的革命家，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决不可能为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剥削广大人民唱赞歌，其革命实践也是一直为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而奋斗的。

革命的发生虽然是由各种社会危机直接造成的，但究其根源，则归结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经典作家看来，社会诸种危机的背后，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他们认为，社会诸种危机的发生是社会基本矛盾尖锐化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6、768、771～772页。

的结果,只有通过对这一矛盾运动的透彻分析,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揭示出社会演化与革命的真谛。“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①在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中,马克思特别重视生产力因素。他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与它相适应,在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主动或被动地不断适应生产力的过程中,社会变革才不断展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的概述,其中阐述了生产力与革命的关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②。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③。这一段话论述了研究革命的基本方法与基本思路,明确指出了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是革命产生与发展的始动因素,只有在生产力不断发展、并与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发生冲突的基础上,革命才有可能发生。也就是说,只有在新生产力不断发展并遇到阻碍时,革命才有产生的历史根据。所以,在论述革命的发生发展时,生产力的发展与其发展的受阻两个方面都讲全了,才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7~6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33页。

对经典作家关于革命论述的较全面和准确的理解。

二、关于革命的胜利

从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可以看出,真正胜利的革命,应包括两个方面:政权的转移与制度的创新。没有制度创新的革命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如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革命取得胜利所具备的条件虽然与革命的发生有许多相同之处,但较后者需要更多和更成熟的主客观条件。它不仅要求社会发生生存危机与发展危机,还要求统治阶级自身出现种种危机。但社会发生全面危机,只能说是革命客观形势的成熟,仍不一定能取得革命的胜利,革命要真正取得胜利,还需要社会新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革命力量的壮大与革命领导集团的成熟。列宁在谈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曾作过总结:“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生产力高度发展和无产阶级的充分准备。”^①马克思在论述革命的胜利时也特别强调生产力的伟大意义,同时也是在讲生产力对革命的制约。在经典作家看来:“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②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革命发生的规律作出总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版,第2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3页。

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发生。’^① “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② 马克思总的意思是强调生产力对革命胜利的重大制约作用,亦即是说,没有生产力的一定发展,即便由于社会危机重重而导致革命的爆发,甚至革命的阶级夺取了政权,也往往是暂时的,只有建立在生产力一定发展的基础上,革命才能真正实现制度创新,政权才能长期稳固。总之,经典作家在关于革命的论述中,对生产力十分重视,认为生产力是革命发生、发展乃至胜利的根本因素。

革命力量的壮大,主要表现在先进革命阶级队伍的不断扩展、广大群众革命觉悟的提高与革命积极性的增强、革命领导集团形成及革命理论的成熟等几个方面。

广大群众能积极参加革命,除了生活贫困发生生存危机外,还需思想觉悟的提高,这就要求革命的领导集团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和思想启蒙。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潜力,使其汇聚在革命的大旗下。对此经典作家有许多论述。另外革命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3页。

理论对确保革命的胜利有着巨大的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群众。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① 总之,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不管是对广大革命群众的启蒙与动员,还是革命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革命领导集团的形成与成熟。由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形成与不断成熟,是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革命的胜利从来不会自动到来,它需要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准备和争取。没有一个在力量和威信方面都足以领导群众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②,是难以取得革命的胜利的。

经典作家们还论述了国际环境对一国革命的影响作用,即把一国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放在全世界形势变化的宏阔视野中去考察,强调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运动的世界性影响。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便有可能越出民族的狭隘地域,对落后国家产生影响和渗透,激化落后国家内部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③。经典作家也多次论述了战争对革命的催化促进作用,这都为我们剖析革命提供了指导。

总之,革命的发生与发展是社会多重因素相互影响与作用的结果,而只有上述革命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都成熟以后,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② 《斯大林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5~116页。

三、关于革命的意义

革命到底对历史发展有何作用,也是革命史研究中的重大问题,经典作家对此也有较多的论述。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是新社会诞生的助产婆。面对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简化和集中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①。“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的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② 革命是“社会进步和政治进步的强大推动力”,且“一个民族在这种剧烈的震动时期 5 年就走完在普通环境下 100 年还走不完的历程”^③。

在经典作家看来,革命与暴力在社会的演化与进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决不能因为革命有流血牺牲而完全否定,必须区分革命的暴力和反革命的暴力。革命的暴力是为被阻碍的生产力开辟道路,是以最快捷的方式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社会制度,一句话,是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与进步。

需要说明的是,经典作家们决不是毫无条件地赞扬暴力革命而完全否定改良。他们认为,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并且生产力遭到现存的腐朽的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阻碍,统治阶级又不思改革,从而导致生产力难以继续顺利发展时,才需使用革命的方式实现社会制度的转型。否则,暴力只能给社会带来破坏,不属于革命。他们也从未排斥和平的渐进的改良方式,但是历史的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1972 年版,第 318 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91、512 页。

实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不愿意自动退出统治舞台,政权的更替与制度的变革,往往需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才能实现。改良一般在社会正常的发展状态下起作用,但它解决不了积重难返恶性循环的困境,如果这种方式在社会转折关头能有所作为的话,也多是革命形势极为严峻,革命力量十分壮大下的结果。将革命与改良完全对立起来,肯定革命就完全否定改良,或肯定改良就全盘否定革命的极端化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第二节 深化中国革命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根据经典作家关于革命的论述,结合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我认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以推动中国革命史研究走向深入。

一、坚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角度探究中国革命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尤其应注意考察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社会新质因素的进步。

带有残酷的、你死我活特征的非常态的暴力革命,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行程中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其发生发展的历史根据何在,它是少数人主观意志的产物还是社会演化的必然结果?革命发生发展的根源问题若不能得到完满解决,革命就往往被认为是少数人争权夺利的手段,是破坏和捣乱,从而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革命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前所述,任何社会革命的出现,并不是少数人主观意志的产物,它是社会全面危机的结果,其根源则在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冲突。一般来说,任何真正的革命都是以新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的,只有具备这个前提,生产关系才有可能相对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从而为革命提供必要的根据。过去,人们研究革命时,往往回避革命时期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只关注社会生产力的萎缩与停滞,似乎只有生产的停滞与生活的贫困,才有必要和可能发生革命。历史的事实往往与此相反,正是由于新质因素的不断发展与壮大,才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动,原有的秩序被冲击,而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能因时变革或变革力度不强,从而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结构,难以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在这里,代表新质因素发展要求的革命从而有了自己存在的根据。把革命与社会发展相连,将其与生产力的发展及生产方式的变革联系起来,这是马克思在社会历史观中的伟大发现,它构成了唯物史观的核心,是马克思划时代哲学革命的基本内涵。所以,我们在从事中国革命史的研究时,必须重视对社会经济的分析,重视对生产力发展的研究,而不是像过去那样,过分注重生产关系的研究和阶级分析,也不能只强调经济危机与破产,似乎只有破产才有发生革命的必要。如果说对辛亥革命的研究,还比较重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革命的关系的话,那么在对国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研究时,就出现了忽视的现象。

有些研究者由于没有重视生产力在中国革命发生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不从新质的生产力与旧生产关系的矛盾冲突中去理解革命,只看到一些历史的表象,革命也似乎成了政党、军阀及政客之间的权利争夺,分不清哪些政党、集团与个人是代表新生产力而战斗的,其结果只能是将革命等同于杀人流血,视坚持革命的英雄人物为阻碍历史前进的罪人,而反对革命、维护旧制度旧秩序的反动人物倒成了推动历史进步的功臣。在这里,历史的审判正好翻了个。

一些人在分析革命时忽视对生产力的分析与研究,除了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缺乏深刻领会外,可能还与下意识里感到中国革命与马克思所讲的革命有所不吻合有关。可以说这

仍然由于是对马克思革命理论存在认识方面的偏差所致。诚然,经典作家关于革命的论述,多是侧重于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分析,但其分析革命的基本立场和方法是有普遍意义的。如上所述,马克思特别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对革命发生与发展的根本促进作用,亦即强调生产力对革命的制约作用,但并不是说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落后国家,没有他所讲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需的同等水平的生产力,就不能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经典作家在分析革命时,比较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方面坚持‘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①必须从生产力的状况出发来研究革命,同时也认为‘不一定非要等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②。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来说,不必等待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才来进行革命。在生产力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革命,夺取政权,然后在人民政权的领导下发展生产力,建设新的社会。所以,不能因为强调生产力对革命的重要性而将生产力水平绝对化。

革命的发生必须有一定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这是正确的,但也不是非到某一规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革命才会发生。事实上,历史是复杂的,导致具体革命发生发展的因素也是多元的,而且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也未必一定引起革命,因为随着社会物质的富裕和统治阶级自我认识的提高,其主动调节社会矛盾的能力也有可能增强;但是真正革命的发生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有一定发展的基础之上也是不容怀疑的。如果在研究中国革命时不研究生产力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5~116页。

发展状况,不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性质就难以搞清,近代中国的革命也就难以与传统的旧式农民起义划清界限。如果不明白近代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革命的伟大意义与作用便无从准确地给予评价。

二、在革命史的研究中,要对近代中国社会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从对社会的整体把握中透视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恩格斯在分析德国革命时明确指出,研究这次革命必然爆发而又必然失败的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①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在分析具体历史事变时,从来都是建立在对社会状况进行全方位分析的基础之上的,承认社会事变是社会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最终的结局是一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经济的决定作用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的,‘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实现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历史是多个意志相互冲突的产物,“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②。所以,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时,要了解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历史的唯物的,也是辩证的。在以它为指导分析历史事变时,既要坚持物质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又要有系统论的观点,即社会各因素的交互作用共同决定事变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95~696、697页。

进程,否则就容易陷入历史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在分析具体问题时,也不是生搬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用以剪裁内容丰富而复杂的历史,使之变得没有血肉,看不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曲折性。事实上,生产力对革命的决定作用,往往是间接地且通过一些附带形式表现出来。“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①虽然这些附带形式不能代替对生产力的分析,但对解释历史事变和革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在研究革命时,除了对从根本上起决定作用的生产力本身进行认真研究外,还应对政治、文化、社会日常生活等诸方面进行考察,尤其是考察当时社会生活诸领域中的革命因素或有利于革命的因素日益增长的状况,从而将革命的发生发展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基础之上。

对整个社会进行研究与分析时,应特别重视对近代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乃至整个民族生存状况的考察,尤其是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生活状况的考察。影响和制约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因素可以主要概括为两个危机一个发展。一是民族危机,二是乡村危机,三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当然也有危机),三者共同影响和制约着近代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民族危机,我们一般给予了较多的重视,但对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及危机与革命的关系研究不够,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中实业界的思想倾向研究甚少,研究的多是其代言人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在这种状况下,要充分说明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从根本上为新生产力开辟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内在根据就存在一定难度。

中国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基本上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两面性中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5页。

革命性的一面为主，这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决定的。所以，为了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研究推向深入，势必应该对中国资产阶级尤其是民族实业资本家的生存状况及思想变化搞清楚。但是这方面的研究以前做得很少，这也是本章重点研究民族实业资本家思想变化及其斗争实践的主要原因。以往对近代乡村危机也缺乏较系统的分析。试想在一个农业国家从事一场以农民为主力军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对农村的变化及农民的生活知之不深，怎么能将近代中国的革命搞深搞透呢！因此我们在分析近代中国革命的时候，必须花力气对广大乡村及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农民作细致的考察，明了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毛泽东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自然新兴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状况也应进行深入的考察，只是这方面的工作做的相对较好，我们在此不作强调。此外，要讲清中国革命的必要性、正确性，也要加强对统治阶级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也是一个薄弱环节。近代百年中国社会的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统治阶级自身的变迁也有了时代的特点。其成员有所分化，其统治方法也有变化，这些变异都对革命的发生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只有认识到统治阶级的变迁，才能明了近代中国革命的阶段性变化，明了不同阶段革命的对象、任务、原因、力量、策略等的转变。总之，只有全面研究社会、研究各个阶级阶层的生活史，才能将一场大革命解释清楚。

要全面理解一次乃至几次革命运动的伟大意义，还需下力气考察近代中国革命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多方面影响。经典作家对革命的伟大意义进行了多方面论述，给我们提供了分析的典范。具体到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还需多角度多层次考察每次革命对近代中国社会诸方面的直接与间接、短期与长远的影响，从而为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作出充分有力的论证。如果不能深入细致地考察清楚革命对近代中国社会各个层面所产生的影响，就无法有力地反